

13.03.



三明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明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郑方伟
题字：涂大楷

三明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
一九八八年九月

目 录

怀念战友范元辉同志.....	
张昭娣 罗炳钦 谢毕真 丘锦才(1)	
尤溪地下党革命活动纪实.....	吴友平 胡祖荫(8)
苏区工运的回忆.....	胡灵英口述(12)
三明市少数民族概况.....	李双柱(17)
清末与民国时期土匪骚扰沙县四乡纪实	张宗健(21)
刘汝明残部在三元.....	林伦榕(28)
抗日战争后明溪城关工商业概况.....	李映秋(30)
宋、元、明、清三明旧学史略.....	牧 莎(32)
三明第一中学发展史.....	赖宝珊 杨文田(36)
三明市闽剧团纪事.....	陈则慧(43)
福建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史略.....	省建一公司(47)
三明纺织厂发展史.....	三明纺织厂(68)
三明市食品厂简史.....	三明市食品厂(82)
罗从彦及其理学.....	郭富小(84)
蜚声海内外的妙莲法师.....	李映秋(88)
伊白汀和他的《零星话》.....	雷臻新(90)
归侨画师裴雨樵.....	徐逢宝(97)
诗人范方与中国现代诗.....(香港)巴桐 张诗剑(100)	
关于《三明新市》一诗的史实.....杜元会(105)	

怀念战友范元辉同志

张昭娣 罗炳钦 谢毕真 丘锦才

我们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范元辉同志，离开我们一周年了。

范元辉同志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战争年代和解放以后，我们曾先后同他在一起战斗，一起工作，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他那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

范元辉同志1908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他的父母亲本是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勤劳俭朴，开荒扩种，逐渐发展致富，土地革命时被评为富农。但父亲思想开明，经常无偿地借粮食给穷苦人家，还捐款兴办村里的公益事业。父亲这种为人厚道、乐善好施的品德，影响了元辉幼小的心灵。

范元辉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腥风血雨、民不聊生的年代。1921年秋以后，他先后在县城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读书。马克思主义在闽西的传播，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使他渐渐地看清了黑暗社会的本质，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热望。1927年7月，他初中毕业后回村里担任小学教员。这时，张鼎丞同志受党委派，刚从广东大埔回到家乡溪南从事革命活动。在张鼎丞同志的直接培养教育下，元辉同志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同年先后加入了青年团和秘密的农民武装组织铁血团。为了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张鼎丞同志和溪

南党组织在建立秘密兵工厂的同时，发动群众、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元辉同志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拿出20块银元，交给党组织购买了一支单响步枪。他白天在小学教书，晚上又担任平民夜校教员，或者走村串户做宣传发动工作。1928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担任村团支部书记的范元辉同志，率领古木督村的青年农民参加了震撼八闽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接着，他遵照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古木督村深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领导团员、青年投身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到1929年红四军解放永定后，他才离开家乡，参加红军主力部队，历任股长、区苏维埃常备队党代表、县苏维埃政府文书。古木督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之所以红旗不倒，成为闽西著名的革命基点，是与元辉同志出色的工作分不开的。

元辉同志作为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不贪恋安逸的生活，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而且在革命危急关头，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闽西人民群众中广为称颂。

1931年，闽西发生了错误的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严重事件，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惨遭杀戮。元辉同志也被无辜关押了一个多月，被剃了十字头，受到多次严刑拷打。原定某晚半夜处决，正要行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滂沱。执行者说：“干脆明天杀他算了”。恰好第二天一早，张鼎丞同志从瑞金赶回到溪南，传达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所谓“社党分子”，他才得以重见天日。元辉同志在这场错误的“清社党”事件中，虽蒙受不白之冤，受尽折磨险些丧命，但他并没有消沉、动摇，而且意志更加坚强，始终坚持革命斗争。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文书等职，跟随张鼎丞等同志转战闽西各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他被留下坚持斗争，先后担任闽粤赣边省委文书、永定县委副特派员、特派员等职。范元辉同志参加革命后历尽艰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皖南事变”后，闽西形势急剧逆转。1941年1月20日，国民党顽固派以两个团的兵力包围袭击闽西特委和各县、区委以及革命基点村，抓捕700余人，屠杀2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闽西事变”。顽固派采取军事进攻、政治瓦解、经济封锁，摧残家属、移民并村等毒辣手段，企图彻底消灭闽西革命力量。我党为了顾全大局，避免磨擦，实行分散隐蔽，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开荒生产，以维持生存，度过难关。当时担任永定县委宣传部长的范元辉同志，在永定东溪塘坑里生产基地和同志们一起开荒种粮，后他被调到永定玉生棋山上和炳钦等一起烧炭。他赤膊上阵，砍柴、挑炭，样样重活都干。那时，我们处境十分困难，生活极为艰苦，经常没饭吃，没油没盐，常常以野菜杂粮充饥。由于营养缺乏，不少同志全身浮肿，晚上两眼发黑，摸不着路。元辉同志的身体也弄得很虚弱，但他总是鼓励同志们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在他的鼓舞下，生产基地的同志们毫无怨言，一个个都咬紧牙关，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在生活上，元辉同志克己奉公，勤俭节约，从来不搞特殊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1946年，他任中共闽粤边临委副特派员，在机关工作。当时经济很困难，生活用品紧缺，按规定他可以领取脸巾、牙刷，但他总是先让给其他同志，把困难留给自己。

元辉同志常说：“如果自己做不好，就会影响别人。”战争年代，他有较长一段时间主管财政工作，部队筹到的钱，一般由他亲自保管。他从严把关，一分钱要当作两分钱来用。即使带一两个同志去执行任务，每到一地，他也从不多吃多占，不私下花钱改善伙食。因为他考虑的是如何把这点钱花在最关键的地方，解决同志们的吃饭问题。如果谁多花了一分钱，都会受到他的严肃批评。每一笔开支，他都要求经手人打收款收据，盖上手印。

元辉同志管理财政开支，毫不含糊，总是精打细算。部队做衣服，他亲自给大家量尺寸，不浪费一寸布，连裤头布也要节省，他考虑到经费困难，能穿就行了。由于元辉同志以身作则，从不特殊，同志们都能通情达理，再困难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而同心同德，共同克服困难。有好多次部队一点存款都没有了，他冒着敌情严重的危险，回家把他父亲埋藏在地下的银元挖出来，作为部队经费。1945年，他的妻子被敌人杀害了，他秘密地回到家里，发现妻子私藏有银元330元，他全部交给了闽粤边临委。这一切，当时只有个别领导同志知道，他从来不张扬，不自吹，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元辉同志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每到一处，都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他是那样和气可亲，与群众亲如一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对他说：“元辉，你来吧，我们再困难也会支持你的，你对革命忠诚，我们坚决支持你！”

三

1943年，我党龙岩、永定各地生产基地受到顽固派的严重破坏，掩护和支持我生产的基点村群众被残酷抓捕杀害，同志们胼手胝足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稻谷、番薯、编织的土箕和竹篮子、烧好的木炭等劳动果实，被顽固派抢夺一空。顽固派还把这些抢掠的东西，包括我们劳动生产用的锄头、犁耙、粪桶等，当作他们“剿匪”的胜利品，在县城、市镇公开“展览”。

这年秋，中共闽粤边委在朱曼平、魏金水同志领导下，在永定召开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步步进逼，已使我们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危局，保存力量，决定由分散生产转变为武装自卫，作出了建立武装，开展自卫斗争，以斗争求生存，以斗争求和平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闽西南经济工作总队，任务是保卫机关，惩办元凶，解决经济。边委任命刘永生为总队长，范元辉为政委。永生、元辉同志坚决拥护边委的正确决定。

部队成立后，立即挺进闽南，按边委的部署行动。

作为一位政治委员，元辉同志十分尊重刘永生同志。在经工总队，他们合作得很好。总队成立之初，边委要求他们亲密合作，带好部队。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同心同德，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永生同志熟练游击战术，善于带兵，元辉同志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在总队凡事一起商量，互相尊重，带的队伍，上下一致，生动活泼，群众纪律很好，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

元辉同志平易近人，言传身教，对同志处处关心体贴。宿营时他利用空隙，与战士们谈心，讲故事，讲革命道理，还组织同志们学文化。刘永生同志学文化积极性很高，经常写日记，在元辉同志的帮助下，他的文化得到很快的提高。

经工总队成立不久，在闽西又建立一支经工分队，巫先科为分队长，陈仲平为政委。总队与分队，一在闽南，一在闽西，经过将近一年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各地群众的斗争情绪，也渐渐解决了极端困难的经济问题。广大基点村的群众从经工队的活动中看到了革命前途，提高了革命信心。经工队的实践证明，实行武装自卫斗争，是完全符合1941年中央对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在闽西南，当顽固派不顾团结抗战大局，大肆反共，屠杀人民的时候，不拿起武器，就不能保证生存，就无法积蓄革命力量，这是用革命鲜血换来的真理。一年后，在经工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王涛支队、元辉同志任支队政委。王涛支队在实际战斗中，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骨干，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成为有四万多人的闽粤赣边区纵队。

四

1948年下半年，范元辉同志担任第八地委（即闽西地委，后改称龙岩地委）书记兼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政委。1949年8月底，各独立团英勇作战、追歼逃敌，永定、上杭、龙岩相继解放，元辉同志和新组建的地委班子及闽西南联合司令部由永定进驻龙岩。当时，各县刚解放，情况复杂，百端待

举，而边缘县份武平、长汀、连城尚有残敌盘踞，社会治安很不安定，摆在地委面前最大的困难是干部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原闽粤赣边区党委调来大批梅县、大埔的同志参加各县接管政权。元辉亲自接管政权，又亲自专程前往福州，向张鼎丞主席汇报，向省委要了一批干部。这时，如何团结和使用来自各方面的干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时有个别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闽西无人才，广东人来登台”，以挑动地方宗派情绪。元辉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股阴风，绝不能听之任之。他在各种干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那种错误的地方宗派情绪。魏金水同志也在有关会议上用党的历史事实，解释党的干部政策，从而及时地制止了这股阴风的扩散。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元辉同志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对外来干部热情欢迎，一视同仁。他总是虚心地说：“我们水平较低，没有经验，要团结大家共同搞好工作。”

元辉同志进城后，环境变了，但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没有变。他一直没有忘记老区人民，十分关心老区建设。解放初，他经常穿着布鞋，爬山越岭，走村串户，慰问军烈属，调查研究，发动基点村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走到哪里，就把党的关怀带到那里。为了解决许多军烈属子弟读书难问题，解放不久，元辉同志就在一次地委会议上作出创办闽西烈军属子弟学校的决定，在虎岭山上建立的烈军属子弟学校开办了好几年，许多烈军属子弟毕业后到各地上了中学或大学，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1955年3月，省委领导伍洪祥同志指示龙岩地委要抓收集、整理党史资料工作，并派当时在省农业厅工作的谢毕真回闽西协助。元辉同志深深懂得，趁着许多老同志健在的时候，抓紧搞好这项工作，对于发扬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激励人民的斗志，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元辉同志直接领导下，地委很快建立党史工作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党史办公室，他亲自兼任主任，谢毕真担任副主任。经费、办公地点也很快得到解

决。各县相应成立的由老同志挂帅的党史工作组，深入基层召开老同志、革命群众、烈军属座谈会，广泛收集革命文件资料。在短短的九个月之内，全区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下乡调查，范围达7个县，37个区，66个乡，45个基点村，被调查访问人数达950人；征集历史文件和整理的资料250多份，250多万字，还有未付印的原始资料90多种，26万字；编印了《闽西党史研究参考资料合订本》两大册；同时还征集了上万件各类珍贵的革命文物，如苏区时期的钞票、印章、旗帜、布告、宣言等等，均上送中央和省有关部门。毛泽东同志在闽西写的重要文章《反对本本主义》石印本原件，就是当时发现和收集的孤本。经过几年的努力，闽西的党史工作取得可喜成果，为后来的党史编写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辉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说假话，反对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和逢迎拍马的坏作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元辉同志对此极为反感，对党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痛心疾首。他敢讲真话，在他工作的地区，“移苗并丘”的瞎指挥受到了他的抵制，因而在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他由三明被揪回龙岩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接受所谓“检查批判”，进行“消毒”，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坚信党总有一天会纠正这一错误，他仍然一如既往，努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范元辉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闪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深深怀念这位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怀念这位人民的忠实公仆。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业绩，将永远激励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奋勇前进。

1987年6月

尤溪地下党革命活动纪实

吴友平 胡祖荫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地下党闽侯、闽清、连江、古田、罗源五县中心县委在上、下奔洋召开扩干会议后，再次受到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四团的围攻。五县中心县委联络组长王振祥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为避免损失，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白决定各地干部分头回各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林白等率刘文耀游击队一部，撤出小北地区往福州市内活动。

十一月，林白前往省委驻地汇报工作前夕，中共福建城工部福州北郊工委在仓前山陈本鸿（乐群支部地下党员）家里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林白，工委书记杨晓春（即杨孝泉），陈仁宽、吴忠灿等六个支部书记（均为工委委员）和部份地下党员陈本鸿等十几人参加。林白在听取汇报后，根据当时形势，研究布置了三项任务：（一）加强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二）整顿组织，加强领导；（三）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为迎接大军南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提出继续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爱国民主运动，组织抗丁、抗税、抗粮斗争。

在这年冬季，工委做了整顿组织、筹募资金、购买武器、组织武装、打入敌人内部等工作。此外对三个支部又布置了二项工作：第一、支部成员就在所在学校和能利用的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工委委员、支部书记陈仁宽利用机会宣传解放形势，揭露反动政府打内战和迫害革命的罪行，号召全市师生起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陈本鸿、吴友平、胡祖荫、潘厚元、柳朝威等都利用所在省高级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省林森师范、商校等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学生运动。吴友平、胡祖荫还组织了在福

州读书的尤溪学生，成立了尤溪同乡学生会，会员共八十多人，遍布三十几所大、中、专和高中学校，利用同乡学生会的机会发动学生运动。第二、陈仁宽因与卢玉震（即卢士民，卢兴荣之子）是同学关系，向工委书记杨晓春做了汇报，经工委研究后，决定由陈仁宽通过卢玉震，向卢兴荣做策反工作。但卢兴荣坚持与我党对抗，所以策反工作极为困难。当时卢玉震因参加革命活动，曾引起卢兴荣怀疑其投共，被封建家规捆绑教育，但玉震没有暴露秘密，后经其养母调解，以读书为名被送回沙县才免受迫害。但回沙县后他仍与仁宽保持联系。

北郊工委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在水部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布置任务，参加会议人员有杨晓春、韩宝玉、柳朝威、吴忠灿、潘厚元、陈仁宽、吴忠灯、杨孝基、陈本鸿等三十几人。会议由杨晓春报告解放战争形势，组织学习七大党章，加强组织纪律，做好对敌斗争和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加速开展尤溪地下党工作。这时将放寒假，根据会议精神，陈仁宽布置吴友平、胡祖荫寒假回尤溪做好两件事：一是发动组织家乡革命力量，开展“三抗”斗争；二是了解尤溪敌情。所以他们寒假回尤溪后发展了贫雇农胡祖燕、卓传风、胡诏论等革命骨干力量，发动他们秘密组织贫雇农，团结广大农民进行抗丁、抗粮、抗税，监视敌人活动，为进军尤溪做好思想组织工作。如他们都在胡厝村、渭洋村等地发动群众进行了“三抗”斗争，建立了革命基点，对尤溪敌情进行侦察，掌握了敌人武装力量有县保安队二百多人，警察局二十几人，便衣队数人，各乡、镇武装班三百人左右。一股是盘踞在尤溪多年的原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卢兴荣，他家里保存有大量武器弹药，所属兵员较多。但他对蒋介石不满，因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剪除异己，将五十二师调往上海参战，结果被日寇歼灭。事后蒋介石表面上将卢提升为七十六军副军长，委以军委会上高参，实际上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另一股势力是原国民党戡乱委员会主任、县参议长洪钟元，其子洪健是县党部书记长，掌握着县党、政、军大权，有保安队、警察局，乡、镇武装力量等，

且思想极为顽固。

二月底，吴友平、胡祖荫重返福州，在省高级工业学校门口左边民房里，向工委委员陈仁宽作了汇报。三月中旬，卢玉震也到了福州，也反映了情况，最后由陈仁宽向工委书记杨晓春汇报，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和尤溪实际情况，工委布置一面在福州组织学生运动，一面在尤溪继续开展策反工作。所以四月上旬在福州组织了一次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进行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有六十几所学校，十几万人参加。在尤溪方面，由吴友平、胡祖荫向卢兴荣部下亲信蔡建全进行革命形势教育。陈仁宽向卢玉震提出二点要求：①向其父亲卢兴荣做策反工作。②要求搞些武器弹药支援地下革命武装。

福建地下党为了配合我南下大军，命令游击队全面出击，消灭敌人；同时，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力争福建早日解放。为此，工委授命陈仁宽具体部署。四月底，他在西湖西边亭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仁宽、陈本鸿、吴友平、胡祖荫、卢玉震、朱其章等七人，会议由陈仁宽主持，以游览西湖为名，具体研究前往尤溪开展工作问题。经研究，确定了三条任务：（一）组织武工队，加强武装组织，建立基点。（二）做卢的策反工作，争取其起义。（三）进一步了解敌情，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了行动计划：①卢玉震立即回尤溪做家庭策反工作，并要从家里搞出部份枪枝弹药。玉震接受任务后，因返尤路费不足，党组织即拿出金戒指一个由陈仁宽交给他做为路费。②胡祖荫先回尤溪胡厝村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武工队。③陈仁宽率吴友平等待后赴尤溪工作。卢玉震于四月底回家，在家里做有关人员和卢兴荣所属部下官兵策反工作。胡祖荫于五月上旬回尤溪，当路经闽清池园乡时被保安队黄芹安部抓捕，受刑一天一夜，后因无证据被释放回胡厝村，他回村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收集民枪、土枪等武器，发展组织胡祖世、胡永汀、胡宗达、陈德美等武工队二十多人，建立了基点村，先后在胡厝、溪坪、后佳、车井等村共发动组织了革命群众一百多人。陈仁宽、吴友平

于五月中旬经长途跋涉回到尤溪城关，住在卢玉震“生利兴”商店楼上。我们白天侦察敌情、晚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三天后，由卢玉震带领三人一起到了安洲岭卢兴荣家里会见卢兴荣，向他宣传我党政策，劝说他起义。经过二天时间的多次交谈，他态度仍动摇不定，最后答复是“红白未定局，不敢盲动，愿做考虑。”并表示同意卢玉震暗中靠近共产党，寻找解放军。

玉震在其父卢兴荣未同意起义情况下，私自偷了驳壳枪一支，子弹数十发交给陈、吴两人。从此卢兴荣转变了对儿子的态度，由怀疑、限制、反对而逐步产生了倾向革命，投向人民的念头。

陈、吴回到福州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工委认为尤溪是解放全省的战略要地，必须加强力量。为此六月中旬陈仁宽又派吴友平回尤溪和胡祖荫一起工作。

卢兴荣当时看到了我军解放形势速猛发展，国民党节节败退，难以扭转败局，尤溪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但他对我党政策仍有怀疑，当他正在思想波动，选择道路之际，闽西北林志群游击队又先后二次派马长光同志到尤溪找卢兴荣部下张胜高以及卢兴荣本人直接做策反工作，并派余维藩等谈判代表到尤溪进行和平谈判。经多方努力，最后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尤溪的协议。

在和平解放前，卢兴荣按马长光的意见，于六月下旬派张胜高带自卫队一个中队，由卢玉震随同，保安队一个中队，共二个中队武装一百多人，三十几个民工挑枪枝弹药，开赴沙县，向我交枪。七月五日尤溪正式和平解放。

苏区工运的回忆

胡灵英 口述 牧莎 整理

我是三明市商业局退休职工，现年81岁。1909年11月出生于长汀县大同区师福田乡的农家里。父亲胡步真，以种田为主兼做木匠，兄弟姐妹十一人，因我最小，故乳名十一妹。

我十七岁与汤寿康结婚，他虽是书香门弟，可七岁失父，十三岁丧母，在其叔父的百货店中当学徒，后又在信美布店当店员。结婚后他参加工会，1931年在我的动员下参加了红军，从事军火保管和出纳工作。1934年在参加会昌、白旄的两次战斗中，耳膜被炸弹震聋致残，后回乡治病。1938年我回长汀后由我做手工养活他。1953年病故乡里。

1929年3月，我在长汀纺识厂当女工，时值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红四军在长岭寨击毙了郭凤鸣，歼敌两千余人，解放了长汀。在红军的帮助下，县委、县工会、县赤卫队等应运而生，我与我丈夫分别参加了工会。由于红军仅住了十八天就撤走了，国民党接踵而来，顿时一片白色恐怖。工人运动来不及开展就被迫转入秘密活动。

1930年5月，我在国货织布厂当女工，这时红军第二次入闽，再次解放了长汀县，党政组织和工会又恢复公开活动，康维雄同志担任县总工会主席，织布厂的工会负责人是余金妹。我业余担任工会宣传工作，主要是秘密动员女工加入工会。不久红军再次撤离，国民党卷土重来，工会又转入秘密活动。由于工人要求改善经济待遇及其它原因，国货织布厂没多久就倒闭了，我转到益民织布厂当工人。

1930年10月，红军第三次解放长汀。在红军帮助下，我们原长汀县总工会负责筹备各基层行业工会，代表共有三十多人，在城区水东街基督教堂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必发、副主席饶根，同时选举了黄玉书为汀州市总工会主席，组建了市总工会办事机构，建立了一大批基层工会。中共汀州市委书记罗忻然、省委组织部长李明光也出席了会议。

1931年初，我调到汀州市总工会宣传部搞宣传工作。当时工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工人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苏区以及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恢复和发展苏区生产。在我的动员下，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我丈夫也参加了红军，在清流指挥部总指挥张荣华所属部队做武器保管和出纳工作。当时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事迹。因此汀州市扩大红军的人数超过原计划的两倍多。这年10月，经赖月华、张九兰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2月7日至13日，全总在瑞金黄竹兜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我与谢成英、王德铭俩同志受汀州市工人阶级的委托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们三人一行，从汀州市步行到瑞金。苏区中央局政府代表周恩来、任弼时，临时中央政府代表项英、中央军委代表叶剑英，全总执行局代表陈寿昌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参加大会的江西、福建两省代表二百五十多人，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与会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还讨论修改了《劳动法》，布置了工会工作和任务，最后民主选举了福建省职工联合会和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1932年6月，汀州市政府与工会组织了一支由市苏维埃副主席饶根带队的二十多名优秀工人代表参加的慰劳队，前往江西慰问参加南雄战役的红军伤病员。慰劳队只有我、张九兰和马子妹三人是女同志。我们用募捐的款购买了二十担牛奶罐头和白糖以及发动女工做的布鞋、草鞋等物品，从汀州市出发，走小路，穿越瑞金、于都、兴国等县境，日夜兼程将慰问品送到战地医院。往